

屠基远：数度潜伏的革命战士(上)◆ 屠新建

商务学徒《简报》总编

1937年，父亲屠基远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利用业余时间读大专。在商务印书馆，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阅读进步书籍。1938年他到夜校教语文、地理，到莘莘夜中学为青年职工讲课，课本是鲁迅翻译的《小约翰》，并运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结合抗日战争的形势教中国地理。同时父亲还到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专修班上夜校，在那里认识了朱介瑾（从苏州来上海求道的，后来成了我母亲）、沈孟先、宋超等同志，到社会主义专科学校去听课，认识了方行、韩述之等同志，并积极参与在商务印书馆的青年中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在张祺、徐文蔚等的领导和介绍下，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上级领导张祺同志也在场。同时，他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党支部负责人。1939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同人会（工会），父亲先任监察委员会主席，后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出版了工会刊物《瞭望》。他们组织年轻职工学习进步书籍和文件，宣传抗日革命的道理。有了党的领导，工人们逐步懂得了斗争的政策、策略，同资本家作斗争，要求承认工人的组织和政治权利，增加工资，从而取得了自从小革命（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工人群众扬眉吐气。其间父亲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党员，其中有凌炯、金尚俭、朱介瑾等同志。

1940年，党组织调父亲到江苏省委所辖上海市委工人委员会任宣传委员会书记，他虽然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支部，但社会职业还是在商

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组织关系由市委直接领导。市委联系人何振声（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告诉父亲，工作很重要，主要是专管工人运动的秘密宣传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父亲领导两个编辑小组，一个发行小组。其中编辑组最得力的是纪康（曾任中央国际联络部处长），还有一组是两个老同志，发行组都是工人同志，来自电车公司、纱厂等，负责人是法商电车公司的。他们编辑出版并发行了地下党的秘密刊物《劳动》等，内容主要是报道工人运动（如香港中华书局罢工事件、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斗争）以及时局形势教育，同时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名义发表了不少支援工运斗争的声明等。1940年下半年，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为扩大宣传，决定办一个可以公开发行的工人运动刊物。1940年11月，父亲担任中共江苏省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宣传委员，负责出版工人运动的公开读物《简报》。

《简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刊物，党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稿件和发行渠道，要求公开发动进步群众的力量。经党组织决定，利用新闻专修科一批同学关系，发动大家来办一份为工人服务的小型报纸，并作为学习新闻的一个实践基地。推沈孟先为社长，父亲任总编辑，纪康为发行部经理。编辑内容也有分工，父亲编国际新闻，纪康编国内新闻，沈孟先编副刊，宋超、韩白、何训良等人参加写作编辑，杨森负责印刷工作，其他不少人参加了发行事务工作。1940年母亲朱介瑾入党后，也参加了《简报》的编辑工作。

为了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文

屠基远，新中国成立之初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上海解放前夕，他受命做了大量地下工作，负责国民党民政系统的秘密接管和组织工作。其子屠新建将父亲一生数度潜伏的故事做了梳理。



屠基远

化知识，《简报》用一版来介绍政治知识，刊名《天地人》，专栏则有《新世界》《点将台》《测字摊》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通俗讲座，同时兼顾职业青年、学生的需要，每期有一版，轮流刊登《青年》《妇女》《店员》《卫生》《读书》《生活和学习》等栏目。又有副刊《茶馆店》，发表工人的意见和文化娱乐文章。

父亲觉得这样的办报过程，也是学习磨练的过程。编辑新闻要阅读多种报刊，用政治观点去分析，常常一边编写，一边学习。为了编辑《测字摊》《点将台》，他和纪康经常

去书摊找资料。母亲朱介瑾在学校宿舍的被窝里，用手电照着查找资料，编辑《妇女》《卫生》专刊。沈孟先编《茶馆店》，为推敲诗歌和民谣，常常弄到深更半夜。

《简报》从1940年11月创刊，开始发行为三日刊，后曾改为周刊，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一共出了79期，发行量达到5000多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之后才停刊。

打入敌营 准备起义

上海完全沦陷后，地下党组织部分同志撤出上海到达南京。父亲化名屠吉安，也到了南京。组织上指示他打入日寇华中铁道系统，但由于日寇控制很严而未果。随后他经党组织的安排，转道苏州参加“江苏省财政厅”训练班，潜入敌人内部展开地下工作，成为敌伪派往各县的财政专员。

苏州也是我母亲的家乡。为了革命，母亲朱介瑾放弃了震旦学院的学业和在上海谋职的机会，回到苏州以开诊所为名，从事地下工作。

1943年3月26日，父母在上海结婚。婚礼在祖父工作的汉口路上的惠中旅社举行。前来庆贺的朋友来自各个方面，有共产党，有国民党，还有敌占区的汪伪汉奸，父亲的领导老闵也来了，坐在祖父母的酒桌上。大家互不认识，相安无事。老友凌秋钧因印刷界出事时差点被抓，正在找组织去根据地，听到消息也来了，被父亲邀到昆山工作。但让父亲大吃一惊的是，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的徐文蔚也来了。他良心发现，暗告父亲：“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快离开上海。”热闹的婚礼上，其实暗

流涌动，惊险无比。知道有叛徒出卖，父母被迫草草结束婚礼，立即由上海返回苏州，住在苏州北栅头，任何人都没有告诉。这里也成为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张祺、李干成、闵一凡等领导都来过。

1944年夏，党组织委派张祺、李干成同志到苏州家中，通知父亲去根据地参加政治学习。父亲终于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根据地。学习还没有结束，党组织就指定刘长胜同志找父亲谈话，派父亲带一些同志回白区组织城市武装，准备迎接抗战的胜利。父亲欣然接受了重任。城工部指示一定要千方百计组织武装力量。父亲组织了屠传泗、屠振青、朱钟麟等亲戚朋友搞枪械。后来，父亲把枪支都交给了新四军。日本投降后，联络员老潘带来消息，城工部领导都已经到了上海，一切工作要向上海方面请示。于是父亲立即赶往上海，看到马路边电线杆上贴出了地下党的标语：“欢迎上海市市长刘长胜！”当时，中央曾计划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占领上海。

但是几天后，在北海路18弄7号我祖父的石库门房子里家中，张承宗向父亲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鉴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已准备了大批飞机空运军队到沦陷区，加上大批汪伪汉奸投靠国民党，我党准备改变战略方针，重点巩固华北，进军东北。因为江南一带是国民党的根基所在，他们一定会拼命争夺上海，所以，我们要避其锋芒，放弃在上海搞武装起义的计划。当前的方针是在城市搞群众运动，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苏州的同志撤回上海，地下工作仍要继续下去。这时，我二姐出生，取名为“新华”。

一生一首翰墨诗——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十七、师徒结缘

在不知不觉中，周慧珺的书法深深吸引了一位痴迷于书画艺术，此时正在艺苑外盲目摸索、不晓门径的懵懂少女，她的名字叫李静。以后天赐的机遇和命运的巧妙安排使她们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令人艳羡的师徒关系。

进小学后的李静很好学，成绩好还会写画画。五年级时很得一位代课女老师的青睐，经常会出题让李静画画，每次画完总会摸摸她的头说：“好好努力，你长大以后会有出息的。”一日，这位老师看到了李静的班主任在批改大楷字，想李静画画那么好，字也一定漂亮吧？就特意提出要看看李静写的一景。从那时起，李静算是结识了书法艺术。

那位女老师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那年她皱了皱眉，竟令一个自尊、好胜的小女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学书之路，这一走便是四十年……但最重要的还是“文革”后期李静与周慧珺的相遇、相知及相守，使她的学书之路步入了正轨，也是周慧珺老师金针度人，引领她走入了书法艺术的殿堂。而能得识恩师周慧珺，完全仰赖于中学同班同学周德音，即周慧珺的大哥周坚白的女儿。

1970年，十四岁的李静进了上海市六十七中学，同班有个女同学叫周德音，长得非常文静、秀气，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李静知道她书法幼承家学，就特别愿意和她接近，交流切磋，由于志趣相投，很快就结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李静路过朵云轩，被橱窗里挂着的一张署名周慧珺的书法作品吸引住了，字体腾挪多姿、刚健骨力，很有节奏感，是她特别喜欢的风格。也许是有缘吧，总觉得这字有些眼熟，好



像在哪见过，可名字却是陌生的。

那天晚饭后，周德音让她妹妹周德林来请李静去她家玩，李静忽然想起下午在朵云轩看到的字，就问周德林：“你家有叫周慧珺的人吗？”周德林回答：“周慧珺是我姑妈。”李静不禁心中释然并笑道：“怪不得我觉得眼熟呢，原来德音的字是跟姑妈学的呀。”后来，李静不止一次向周德音提出，想拜她姑妈为师学习书法，但总是一次次被婉拒。周德音说姑妈生性安静，不容易接近，她是不肯收学生的。

李静的要求未能被接受，按理说她也不是个很执拗的人，可不知为什么周慧珺的名字和她那特别的书风像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似的，无法忘怀，更不愿放弃。从此，跟周德音的姑妈学书法成了她当时最大的愿望。简直是迫不及待，茶饭不思了。思来想去，于是提笔给周慧珺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信里求学之心溢于言表，自以为是能感动她的。可是信发出后，左等右等也没等到这位同学姑妈的回信，心想周慧珺真像周德音所说的不太好看近吗？可她还是执着且焦虑地等待着。

苍天不负有心人，不经意时机悄然而至。1972年，在一次上海市书法展上，李静终于得以和仰慕多时的这位同学的姑妈不期而遇。那天风和日丽，李静和周德音相约去美术馆看书法展，走到大门口时，周德音推了她一把说：“你乱张望什么呢？到时可别再怨我不介绍啊，喏，这就是我的姑妈！”望着已经到她眼前的这位心仪已久的周慧珺老师，李静脸涨得通红，不知所措，紧张得哑了口，想说的话全都噎了回去，傻傻地呆在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周慧珺很善解人意，见李静紧张得不会说话了，笑了笑说：“你的信我收到的，只是我这人懒得写信，一拖拉也就放下了。这样吧，下周三我休息，你下午两点左右来我家吧，把你写的字带来，我们谈谈。”

就这样，李静和周慧珺遇上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师生俩反复地感叹过今生的相遇。佛说：“相遇是缘。”周慧珺是李静今生注定要寻觅到的，书法给了她这样一个理由和契机。而周慧珺，也正是在回眸一瞥之际注定了和李静的缘分。以后周慧珺也曾对李静说过：“这一生有了你，多了很多快乐。”对于李静来说，能拜周慧珺为师才是她此生最大的幸运，后者改变了前者的整个人生！

4.又发生了一件新的纠纷

本来在林则徐看来，英商具结是不成问题的——值银一千余万两的鸦片都已缴出，比缴烟容易得多的具结还能有什么麻烦？但在查理义律看来具结比缴烟关系更大，“缴烟只是一时的事，具结则是长远的事”；也就是说，查理义律虽一时被迫缴出鸦片，但他仍然没有忘却鸦片贸易的长远利益，并相信鸦片贸易不难恢复。据说4月21日查理义律接到林则徐催促具结的谕文，立即把它撕得粉碎，声称宁可杀头也不能具结，这可见他抗拒具结的强硬态度。

林则徐本没有长期停止与英人通商的意思，到5月21日鸦片完全缴清后，查理义律就通告不许英船开来黄埔进行交易，并率全体英商离广州前往澳门。林则徐曾数度催促英船进口或开回本国，不准再在沿海逗留，查理义律都置之不理。6月5日，查理义律忽又具稟请求暂在澳门进行交易，存心想在澳门再干鸦片走私的非法勾当，林则徐当然批驳不准。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事是值得特别提起注意的。第一，这时有英船三十二只停泊海面，急于想要进口贸易，但被查理义律无理阻止，所载货物大都潮湿霉烂，因而引起英国正当商人对查理义律的不满。第二，新到英船仍有夹带鸦片的，虽因各海口稽查严密，整箱鸦片无法运进，但沿海渔民购买零烟转售获利的，仍有发现；而且英商还私放小船，装载鸦片，偷往潮州、南澳、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等地，用低廉价格诱人购售。第三，英船虽不进口，而其他各国船只仍照常贸易，尤以美船乘机活跃，获得巨利；同时英商货物多有假借美船输入的，而英商所需要的中国茶叶，也由美船带出转交英船，中英通商仍在若明若暗之中继续着。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查理义律决不肯放弃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甚至不惜以停止其他一切合法贸易来要挟中国，而美国呢，它表面上装得十分“恭顺”，实际上充当英国的帮凶。

具结和商船进口（或回国）的争执不曾得到解决，不幸又发生了一件新的纠纷，这就是所谓林维喜案。这纠纷的发生，使中英两国间

除了鸦片问题的交涉外，又加上了法权问题的交涉。

7月7日，英船水手酒醉行凶，棍殴沿海村民林维喜毙命，林则徐严令查理义律负责交出凶犯抵罪。查理义律却私自在英船开庭审判，结果只对行凶的五个水手处以轻微的罚金和监禁，并具稟推说凶犯未能查出。林则徐斥为“谬妄”，仍勒令交出凶犯按中国法律惩办；而查理义律竟置之不理，甚至抗不收阅林则徐发来的谕文。8月16日林则徐就亲自到香山，下令驱逐英商离澳门，并断绝食物供给，查理义律只得率英商避居到船上。

8月31日，英国政府由印度派来兵船数只，查理义律得到这支兵力，胆量为之一壮，竟想用武力来抗拒林则徐。9月4日，他率船向九龙开炮进攻，广东水师奋勇迎击，岸上炮台也发炮声援；交战十小时终于把英船击退，并击翻英船一只，杀死英兵至少十七名，广东水师死二人，伤六人。以后到9月12日，广东水师又在沿海烧毁鸦片趸船一只。

查理义律见武力抗拒无效，就托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代为转圜，请求再行商议各项问题。林则徐允许了他的请求，计自9月中到10月底双方交换多次文件，但商议并无多大进展。自然所商议的问题仍不外缴出新到鸦片、具结、交凶和商船进口（或回国）等几项，而最大难关则在具结一事。查理义律虽表示愿意具结，但对林则徐所提“货尽没收，人即正法”的要求，只肯答应“货没收，人驱逐”，双方争执集中在“人即正法”四个字上。

恰在10月间，有英国商船多只自愿遵令具结进口，而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商船，也全部具结进口，这就更使得林则徐坚持必须具结的原定办法，也给了查理义律的威严和权力以重大的打击。到11月初，又有英国商船数只遵令具结进口，查理义律恼羞成怒，竟率英兵船两只到穿鼻海面横加阻止，当时就与广东水师发生冲突；但在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督兵奋勇迎击之下，英船终于战败伤逃。此后在11月间，广东水师又曾和英兵船接战数次，每次都获全胜。

鸦片战争始末

司马牛

